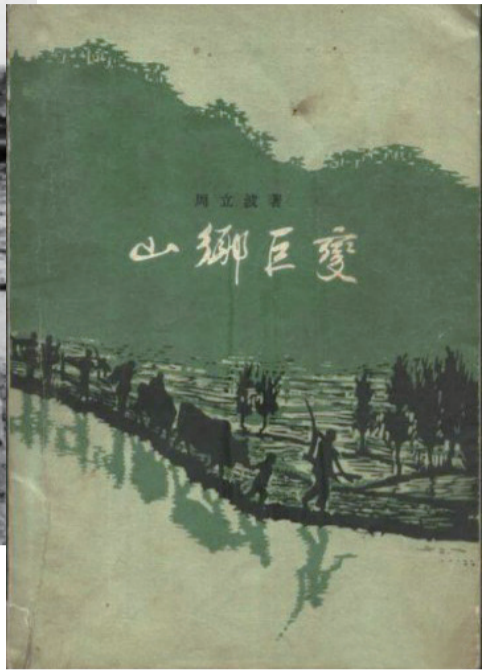


《山乡巨变》诞生记

□慕津锋



周立波



个土改工作人员使用。1951年,《暴风骤雨》荣获斯大林文学奖。这让周立波深切地体会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于自己创作实践的重大指导意义,从而更加坚定了沿着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继续前进的信心。

《山乡巨变》的创作经历

1954年末,为深入了解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在北京工作的周立波决定回到家乡湖南省益阳县邓石桥乡清溪村体验生活。回到家乡后,周立波参加了该县谢林港区发展互助组,并协助建立初级农业社。周立波和乡亲们相处亲如一家人,他很爱学习。那时的周立波时常兴致勃勃地看乡亲们驱牛、骂牛、“喷”牛、相牛、用牛,还喜欢听他们讲乡下的事情,不但听得认真,还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期间,他写出了反映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试办初级农业社的短篇小说《盖满爹》。该小说的原型是周立波在乡下认识的一位木匠出身的乡农会主席、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黎盖。但周立波对自己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并不满意,“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印象,但等提起笔来,却又写不出什么。印象虽多,但都很表面,对于人的心理、口吻、习惯、性格和生活细节都不熟悉,提起笔来,能写什么呢?”周立波已不满足于这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般的走基层创作方式。

这段基层生活使周立波决定,自己今后的文学创作将致力于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新貌和农民新生活。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经过认真考虑,1955年冬,周立波举家搬到湖南益阳县桃花仑乡山湾居住。为便于做群众工作,周立波担任了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在家乡,周立波每天和社员一起学习、开会、生产劳动。晚上,收工回家,他便坐在书桌前,有时读毛主席著作,有时学习合作化运动政策,其后便是将白天劳动中记录下来,整理后写入作品之中,有时灵感来了,一握笔便到了天明。双抢季,他和社员们一起在似火的骄阳下割禾、插秧。为此,他的背上晒起了许多水泡。有一次,在扯田藤子角时,周立波用力过猛,摔倒在田里,社员们笑称他为“泥古牛”。

周立波则风趣地对社员说:“我要真像条牛才好,鲁迅先生教我们‘俯首甘为孺子牛’嘛!”干农活时,周立波和社员们一样,腰里系块浅蓝色围巾,扎脚勒手下田劳动,他还能挑起七

八十斤的担子。1956年初,大海塘村里抽一口老山塘,村民们都去挑塘泥肥田。要挑起上百斤担子沿着又窄又陡的跳板担上塘坑,这可不容易。社长陈桂香不想让周立波去,还藏起了他的扁担。没想到周立波却从邻居家借来一根扁担,挑起塘泥来了。

住在竹山湾时,周立波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鸡一叫,他就起床锻炼身体,打太极拳,然后洒扫庭院,上午写作,下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晚上开会,或走访或找群众聊天。由于周立波性格谦和、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乡亲们都爱和他接近、谈心、拉家常,甚至连夫妻吵架的事也要请他去说和。



周立波(左一)深入农村工作一线

周立波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他知道好友邓益亭(《山乡巨变》中“亭面糊”原型)爱喝酒,所以家里总备点酒,他家炒了好菜总会叫上邓爹喝一杯,“亭面糊”筋骨有点痛,周立波到长沙开会,还特意给他带回两瓶上好的虎骨酒……对于好友邓益亭,周立波极为喜欢。邓益亭是个作田老把式,当他在田里吹牛耕田,周立波就站在田埂路上,仔细观察,看他用牛的动作,听他骂牛的话语。田间休息,他们就坐在田埂上“喷牛经”,有时候周立波还挽起衣袖,自告奋勇当“亭面糊”的下手。

社长曾五喜与周立波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商量工作,干农活。当年,周立波曾根据曾五喜的事迹创作过新闻通讯《曾五喜》,对周立波的真性情,曾五喜心里一直留有深刻印象。“周老虽是大作家,但同农民合得来。一次,我正在田中踩草,周老见了也自动脱掉鞋袜,卷起裤脚下田,迈边问情况。那年,我22岁的大儿子在劳动时触电身亡。周立波连忙赶来慰问,眼泪双流。他见我无钱给儿子买棺材,连忙赶到乡政府同干部商量,把没收地主的一口楠木棺材给了我,帮助把儿子埋了……”正是由于周立波的这些举动,他给乡亲们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立波胡子”。

由于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当地农民的工作生活热情高涨,这使得农村面貌一新,这种巨大变化激励着周立波要拿起笔去创作。为更好地收集素材,周立波用了5个笔记本记下了20多万字的素材。

1956年6月,经过充分准备,周立波开始动笔创作自己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正篇)。在创作中,为把农业化的整个过程编在故事中,周立波着重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他运用具有冲突效果的典型事件和观察入微的精细描写,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年轻干练的邓秀梅、大公无私的刘雨生、性格沉稳的李月辉、

真挚可爱的“亭面糊”、顽固勤劳的陈先晋、固执单干的“菊咬筋”等等。周立波将这些代表了现实中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不同的心态和行为进行了生动刻画,使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那样鲜活。在创作中,周立波使用了一些当地的方言土语。为了能让读者看懂,周立波采用了三种方法:一是节约使用过于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须使用估计读者读不懂的字眼时,就加注解;三是反复使用,使得读者一回生,二回熟,见面几次,就理解了。在写作中,周立波非常注意章与章之间的衔接,为故事中现实事实的逻辑发展,他巧妙地运用了文学创作技巧。为此,他将自己读过的《水浒传》《儒林外史》中的成功之处加以使用。

这一年,当周立波在创作《山乡巨变》时,他的亲戚满妹的一个女邻居来找他打听她的丈夫。这位年轻妇女当时身上穿着新婚时节的大红玻璃短棉袄,而她的丈夫却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她的遭遇和面容给周立波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她身上,周立波发展了小说中李盛氏的恋爱故事。

1957年12月,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周立波终于修改定稿。在《山乡巨变》正篇即将创作完成之际,周立波考虑到篇幅的原因,以及自己还要写《山乡巨变》的续篇,便把之前多写的有关秋丝瓜和龚子元一章删去了。1958年1月,该小说开始在《人民文学》杂志连载。当年6月,《人民文学》连载完毕。小说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讨论。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为读者树立起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亭面糊”、王菊生、张桂秋等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亭面糊”这位老农形象是那样的丰满与立体。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山乡巨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每一章集中刻画一个人物,描写一件事情。周立波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富有个性化的行动,突现人物性格。正因如此,读者认为小说《山乡巨变》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塑造得是如此的逼真、生动。这部小说中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够成功塑造,其实与周立波注重日常生活的观察与分析密切相关。周立波在《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一文中,曾写道:“这些人物大概都有模特儿,不过常常不止一个人。比方,王菊生的形象,有些是我的一位堂弟的缩影,有些是另外两个富裕中农的形态。面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通的性格,我们一位邻居恰巧是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贫农。但书上也不全是写他,我碰见的面糊不止他一人。陈先晋这个人物的家里我只拜访过一次,平素从别人的口里,主要是从他亲戚的口里,多次听到谈起他,而且,我也观察和分析了和他属于同一类型的另外几个较为守旧的贫农。”

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原型其实是不能等同的。但由于周立波刻画的人物形象过于生动,很多人在读完小说后,都会不由自主地同生活中的原型连在一起。这往往给生活中的人物带来困扰。《山乡巨变》也有这个问题,这让作者周立波也非常无奈。1959年冬,“秋丝瓜”的原

型就找到周立波家中,“秋丝瓜”在小说中是富裕中农,对合作化还有抵触,小说出版后,当地人民公社竟然根据小说情节把他归为破坏人民公社的斗争对象。“秋丝瓜”浑身是嘴也洗刷不清,只有请周立波来拯救他。周立波一边叹气一边给人民公社写信替他辩解。周立波的堂弟也曾跑来质问周立波,为什么把平时他们谈心的话都写成“菊咬筋”的事,出他的丑,周立波也只好耐心地给他解释。

当时《人民文学》就在“编读来往”栏目中刊登了一些《山乡巨变》读者的来信,讨论了一些山乡巨变的问题。同年7月,《山乡巨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小说被誉为“《暴风骤雨》的续篇,描写了中国农村的又一次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出版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关注和推荐,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195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人那家〉》一文。在文中,唐弢针对有人针对周立波淳朴厚实的风格提出的异议做了有理有据的辩解,他在文中说:“在一切成熟的——不管是年轻的或者年老的作家的笔底,新的风格正在成长。暴风骤雨是一种风格,风和日丽也是一种风格;绚烂是一种风格,平易也是一种风格。不同的风格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服务得很好。”同年9月,《文艺报》刊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十年来优秀作品”目录,其中《山乡巨变》排名第三。小说《山乡巨变》在人物刻画和语言艺术上获得了文艺界的一致盛赞,并得到农民朋友的喜爱。

1958年7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在文中,周立波向读者提到了写续篇的打算。1959年初,周立波便开始创作《山乡巨变》续篇。同年11月,周立波完稿。1960年初,小说续篇在《收获》杂志第1期上全文发表。同年4月,《山乡巨变》续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3年6月,经周立波修订,《山乡巨变》正续两篇合并为一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对于这部42万多字的长篇巨著,周立波先后进行了6次大的修改,其中在益阳修改了3次,回北京又改了3次,他亲自誊写的字数达六七十万字。

1960年,在第三次文代会上,茅盾曾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中,对《山乡巨变》有过评价:

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山乡巨变》续篇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在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越来越熟练了,而且,在繁复细碎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小事,亦颇幽默可喜。这部作品,结构整齐,层次分明,笔墨干净,勾勒人物,朴素道劲,这些都是他的特点。作者好用方言,意在加浓地方色彩,但从《山乡巨变》正续篇看来,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的描写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地方色彩,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赘了。

1960年以后,小说《山乡巨变》相继被改编为同名湘剧和花鼓戏,在湖南演出后颇受欢迎。特别是经董子良改编、贺友直绘画,将该小说绘制为同名四册连环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61年7月至1965年3月间陆续出版,行销全国,并在1963年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荣获绘画一等奖。这套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的推出,无疑扩大了小说原著的影响力。

「宁可抱香枝上老」

——追忆作家、出版家岑桑

□陈锡忠

今年春节,我本来约好年八开车去佛山向岑桑老师拜年。岑老接到电话也十分高兴。谁料95岁的他在年初五就住进医院重症室,因不允许探病,他的儿子岑之邦给我发来微信:“我父亲自我感觉不乐观了,他让我向你道别,感谢你一直以来对他的关爱,祝你幸福。”2月26日下午我接到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俊发发来岑老仙逝的噩耗,心情悲痛。

岑之邦对我说:岑老2003年已心脏搭桥,但他一直用坚强意志和疾病作斗争,但近日情况急转直下,但仍下决心与病魔作斗争。这让我想起他写的《死不了》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老头,你的风雨人生,虽则苦涩多于甘甜,也谈不上有何成就,但老天爷该给的都已给你,自知知足和无憾了,若仍怨天尤人,就实在太不识趣。此刻已到了你履行最后义务的时分。”

我对岑老神往已久,我读大学时就含英咀华地读了他的《当你还是一朵花》。22年后我与他成了同行。当时他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我在花城出版社当编辑。因同在一幢大楼办公,我们常见面,他个子不高、明亮睿智的眼睛、洪亮的嗓音、笑脸迎人。岑老平易近人,我多与他沿着岁月的脉络,聊起他那流光浸润的往事……

1926年12月,岑桑出生在蚕桑之乡顺德。他原名岑汝养。出于对故乡的怀恋,就用岑桑(谐音“蚕桑”)作为笔名。9岁那

年,母亲不幸病故,正是:此生萱堂未晚咄,怎堪忽作阴阳别。卢沟桥事变时,11岁的岑桑随父逃难去了香港,在店铺做学徒。他喜欢读书,有一天,他来到父亲病床前,哀求道:“阿爸,我好想读书呀……”父亲难过地说:“我们能活下来已不容易,读书就别想了。”

不久,父亲也撒手人寰,12岁的岑桑成了形单影只的孤儿。念初中二年级时,岑桑目睹不少穷苦学生因交不起伙食费而被迫停膳,他拿起笔,发表了短篇小说《停膳》。在中大读书时,他蠢蠢不倦地发表了六七十篇文章,以笔为剑,揭露社会的黑暗。

新中国成立初期岑桑奉调广州市文化局。岑桑的文气洒脱,笔尖锋利,他写的国际小品脍炙人口。195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国际小品集《廿世纪的野蛮人》。1959年与王伟轩合作写出长篇报告文学《向秀丽》,反响极大。

1968年至1971年,岑桑在干校生活是异常艰辛的。他们每天都吃白萝卜菜。作家易征对我说起他与岑桑互“取”东西的一个笑话:由于没有什么东西吃,所以家里人莫不托人从广州送点吃食来,而岑桑知道易征的小瓶里装着砂糖,常抓一把来吃。易征也不客气,不时打开岑桑的饼干盒,取吃他的炒米糖。俩人心照不宣,也许易征“取”的次数太多了,有一回,易征打开那铁饼干盒,一看炒米糖已经没有了,只有一张小纸写着:“打倒易征!”易征又好气又

好笑,他们就是这样在苦中取乐啊。

严冬终于过去了,所有磨难不过一众人小。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吹散了笼罩在岑桑心头的乌云。他短短几年出版了十多本作品,其中有《岑桑散文选》《岑桑作品选》,他以百倍的努力在文学的道路上踟蹰风发。岑桑是一位有胆识、有开拓精神的出版家,他冒着极大风险,出版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出版后岑桑受到巨大压力,但他无怨无悔。岑桑助人为乐的例子不胜枚举,他去世后,几十位作家都向我诉说对岑老当年帮助人的感恩之情。人已不在江湖,但江湖上的他仍仰视他,难得!

在岑桑几十年编辑生涯中,常常一坐下就埋头处理来稿,或不厌其烦回信给各地作者为修改书稿建言。他中午也不休息,当同事们午睡醒来时,他已微笑着诵读自己文采闪烁的新作。大家常见岑桑掏出小手绢,将手绢打了个结。大家问他:“干什么呀?”岑桑自嘲般微笑:“今晚约好去招待所见作者,我怕事情一多忘了,先打个记号,擦汗时好提醒自己呀。”资深编辑谭子艺退休后创办了一份时报,请岑桑当名誉主编,也邀我兼任副总编辑。所以我常到岑桑家商量办报的事。他的家布置得整洁、朴素。客厅上挂着“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对联,岑桑说话声音洪亮,口头禅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意思是勉励大家考虑问题

立足点要高,才能办好事。风起风落总是缘。岑桑对我也十分关心,我申报正编职称时,他为我的随笔集《向人生问路》写了“专家推荐意见”,他的鼓励令我念兹在兹。

岁月漫漶,1990年64岁的岑桑办了退休手续,仍担任全国第一部地域性大型文库“岭南文库”执行主编。2017年11月省作协举行“广东文学名家岑桑学术研讨会”,15位评论家认真分析岑老的文学作品特色,我也应邀在会上作了《作家生命体验的倾诉:谈岑桑散文厚土的三个层次》的发言。那天,鹤发霜鬓的岑老格外高兴。人有真情自丰盈,岑老生前最爱唱的

是捷克民歌《夕阳爱抚着白桦林》,我想他就像那树干修直、枝叶扶疏的白桦一样为人正直、洁白、凛然……岑老最爱的格言就是宋朝才女朱淑真《黄花》诗中含义隽永的“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岑桑是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出版事业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一生为出版事业和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荣获“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岑桑老师啊,我在3月4日的追悼会上送您的最后一句话是:“福寿双隆,朵朵花永在,才德兼萃文库常昭。”广大读者永远记得您的《当你还是一朵花》和创岭南文化金字招牌的《岭南文库》,您是出版、文艺战线上永不凋谢的一朵花。



端午

端午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民间习俗甚多。相传屈原投江,人们划龙舟、吃粽子以纪念他。

原上草
郑为人作